钩 沉

千古冤案：武则天“鸩杀太子弘”

孝敬皇帝李弘（652-675年），是唐高宗李治第五子和一代女皇武则天的长子。675年猝死，被唐高宗追谥为“孝敬皇帝”，是唐朝第一位死后封为皇帝的太子，以皇帝规格安葬恭陵，开创了太子死后追谥皇帝的先例。

李弘的猝死，曾被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诬蔑为武则天“鸩杀太子弘”，至今备受争议。笔者据史书记载等资料，确证李弘死于肺结核病，所谓武则天“鸩杀太子弘”是一桩千古冤案。

母以子贵，武则天逆天改命。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以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即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病死后，直至永徽二年被唐高宗李治“复召入宫”之前，武则天一直居住在长安感业寺（遗址在今西安市北郊六村堡东北）。在封建帝王之家，如果皇帝没有嫡长子（皇后生的儿子），则会立庶子（嫡子以外的众子），庶子之母地位也因此而尊贵。

永徽二年（651年），唐高宗将在感业寺为尼的武则天重召入宫，封为昭仪。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在宫中诞下长子李弘，是为高宗第五子。由于王皇后没有子嗣，当时的太子是高宗的庶长子李忠。永徽六年（655年）正月，高宗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李弘由此成为高宗的元子（嫡长子）。同年，高宗立李弘为代王、胞弟李贤为潞王。显庆元年（656年），高宗下诏令废黜太子李忠，改立四岁的代王李弘为皇太子。

《资治通鉴》记载，永徽六年（655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显庆元年（656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有鉴于此，正因为长子李弘的出生，以及其被立为代王、皇太子，对进一步加强武则天在宫廷中的地位，进而战胜王皇后、萧淑妃，都具有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子亡母悲，帝后皆悲伤凄然。李弘幼为储君，深得唐高宗李治宠爱与重视。高宗曾对侍臣称赞太子：“十分仁孝，接待大臣符合礼节，从不曾有过失。”太子李弘因仁孝而得到朝野内外赞誉，但体弱多病，后期监国政务多由东宫官员戴至德、张文瓘、萧德昭等人代为处理。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李弘随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出行洛阳，在合璧宫绮云殿猝然离世，年仅二十三岁（虚岁二十四）。高宗非常悲痛，破例追加李弘为皇帝，这是唐朝建国以来父亲追赠儿子为皇帝的先例，足见高宗对太子早逝的深深哀痛与惋惜。五月，高宗以皇太子“慈惠爱亲，死不忘君”诏令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并以天子礼仪厚葬于洛阳郊区的唐恭陵，百官服丧三十六日。高宗还亲自书写《睿德记》缅怀李弘，碑石树立于陵墓之旁。

李弘之死，是大唐江山的一个伤口、是武则天一滴化不开的泪珠。圣历二年（699年）二月，武则天自神都洛阳，封禅嵩山、经缑山，拜谒太子庙并留下墨宝“升仙太子碑”，它被誉为“天下女子书”，文采与书法凌然超世。尤其碑额，以鸟形飞白书写，令人叹为观止。在女皇幸缑山时，年已76岁高寿，即使意志再坚如磐石、韧如蒲苇，难免也有力不从心的瞬间，服老与念旧的芽苗也会探头，何况李弘是她的最爱与最痛，儿子之中再无此贤才。江山后继之忧、年迈之困扰，一时拥堵心间。而当她翘首遥望太子冢，又微合双目遥想升仙的周太子乔，蓦然间，有庄周化蝶般的恍惚。虽此太子非彼太子也，但隐隐之中，心柔软似丝绸，瞬间释然了。乔就是弘，向她频频招手，她似乎与儿子一并驾鹤飞升了。现世的喧嚣，皆被抛在了鹤的双翼之下。于是乎，她仰望苍穹，大气凛然，挥毫泼墨。描摹仙界之奇景，歌咏大唐之功业，暗寄慈母之暖情。借一个轻灵的传说，去带走一个沉重的故事。

太子庙，供奉着周灵王的儿子乔；唐恭陵，安葬着武则天的儿子李弘。虽遥隔千余年，两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皆为太子，江山的承业者；皆俊逸贤德，才华横溢；皆宏图未展，凋谢在光华的开屏之年，乔17岁，李弘24岁。李弘殁后以皇帝规格安葬，史无前例。一太子一冢，如此奢华，不仅彰显了大唐的国力，更显高宗与武后失子之痛、爱子之良苦用心。

久病猝死，李弘确死于痨瘵。关于鸩杀李弘的记载，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即对此提出异议，称：“《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可见“鸩杀说”值得怀疑。另据史料记载，咸亨二年李弘就因痨瘵缠身而不能胜任监国重任。时隔四年后去世，高宗在《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中更直接提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意为李弘自被立为太子后就染上痨瘵，又接受父君之命带病理政，以致操劳过度，使旧病加剧，最终病卒。可见官方认定李弘的确是因痨瘵恶化而死。其文如下：“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诀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

无独有偶，公元1832年，时隔一千一百多年后，法国拿破仑二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因先天性肺结核猝死，年仅21岁。肺结核在西方曾被称为“死亡之首”，在我国更有“十痨九死”的说法。直到1882年发现致病的结核分枝杆菌，1944年分离出链霉素，以及抗生素、卡介苗和化疗药物相继问世，肺结核才最终不再与死亡同名。

历史烟云已然远去，记载着岁月的沧桑，承载着丰富的遗存，亘古不变的是那不朽的精神之塔。正如屹立乾陵一千三百多年的武则天无字碑，“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必将荡涤被刻意抹黑的蒙尘。历史，终将会还原一个真实的女皇武则天。 □董昌辉

岐山臊子面

秦 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你来到周礼之乡、凤鸣岐山，不能光看三千多年周原的流光溢彩，更要品尝一口西岐大地的“神来之食”——岐山臊子面。

到了岐山县，先吃臊子面。这碗面里蕴藏着三千多年博大精深的周礼文化，据史料记载，岐山臊子面起源于周代“祭祀”礼仪中的“馂馀之礼”。周文王姬昌是周王朝的奠基者，据传文王挥戈斩蛟龙，将蛟龙肉汤做好后，他亲自掌勺浇汤，将第一碗端出去泼汤祭祖，祭拜上天和先祖，然后将第二碗面亲手端给自己的母亲，最后才把第三碗面端起来自己品尝其味，岐山臊子面食用的习俗就来源于此。庄重典雅的“馂馀之礼”，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演变成“馂汤之俗”，由宫廷贵族的饮食礼仪演变成民间的饮食习俗，一碗普通的臊子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

岐山人在日常生活中就餐座次的排列上很有讲究，无论家宴还是招待宾朋，最上席的位置是在座辈分最高或最年长或最德高望重者，其余位置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摆放菜品的程序应是先放在上席位置，由上席人先享用之后，依次下席人才动筷子。

主人把臊子面端上来，先端给最上席的客人，然后恭敬邀请上席客人品尝，上席客人品尝之后示意“好着呢”，其他人才动筷子开始吃面。岐山人宴席有上下之分，人有长幼之别，吃有先后次序，彬彬谦让，这种顺序体现了西周时期，比较讲究饮食行为的伦理道德。

这一碗面里蕴藏着传承了三千多年的古代养生秘方。从食材来看，五形五色俱全。面条用小麦面粉制成，底菜和漂花取料于可食植物的根、茎、叶、花、藻五端，取色于红萝卜、秦椒之红，黄花菜、鸡蛋饼之黄，蒜苗之绿，黑木耳之黑，小麦面粉、鲜豆腐之白，五色五形，把食材列成一个清单，就是一张十分讲究的中草药养生处方。

其中还有一味食材最重要，但往往被食客忽略。它在一碗臊子面里看不见、摸不到，却不可或缺，燻臊子、调臊子汤必须有，它就是臊子面的灵魂——岐山醋。岐山醋的酿造，原料为小麦、高粱、大麦、黄豆、玉米“五谷”，经过熬煮，酿成需二十多道工序，取“五谷”日月之精华；从味觉和口感来看，五味俱全。所以说，这一碗臊子面就是一个绝佳的古代养生秘方。

这一碗面里还蕴藏着古人为人处世的哲学智慧。一碗岐山臊子面中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俱全。吃一碗岐山臊子面，就可以品尝到人生五味，五味调和便是香甜美味、人生圆满；五味不调和，则难以下咽，人生坎坷。一碗岐山臊子面中底菜漂花各有沉浮。下有底菜、上有漂花、中间有面条，预示人的一生沉沉浮浮，也只有沉沉浮浮的人生才完整、才香甜、才圆满。

面中香醋无处不在，但又不可或缺，没有好醋，燻不出好的肉臊子，做不出让人们魂牵梦萦的岐山臊子面。人生上下求索，长路漫漫，一碗臊子面，就是一个人生。做一碗臊子面，需要经过煎熬几十道程序，煎和熬是形成美味的方式，人生亦如此。吃一碗臊子面，需先端起碗。一手端碗，一手用筷子夹食，吃完面条要放下碗，预示人的一生，要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大自在。

岐山臊子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三千多年的文化积淀，早已名扬三秦、享誉中外。来到岐山，咥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是勤劳朴实的周原人对远道而来的贵客最热情、最实在的待客之礼，也是几千年来周礼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与传承。

□冯广辉

陈寿与汉中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师从同郡学者谯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曹魏灭蜀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48岁的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

这部耗费了陈寿毕生精力创作出来的史书，使“三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文化现象中，汉中有其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

汉中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个郡，南有四川盆地、北有关中平原，是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从汉末张鲁在汉中建立五斗米道政权，到215年曹操攻打张鲁夺取汉中，留夏侯渊为主帅镇守汉中，再到刘备218年从成都而来与曹操争夺汉中，219年取得胜利进位汉中王，一直到263年蜀汉灭亡，汉中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历史大戏。因此汉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三国遗迹，三国文化资源在汉中非常丰富。汉中大地上发生的这些惊心动魄的三国故事，都因为陈寿的记载而被流传下来。

《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国鼎立的历史。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陈寿到过汉中，但他对汉中却情有独钟。汉中作为一个地名，在陈寿的《三国志》中频繁出现。据统计，《魏书》共30卷其中有21卷共61次提到汉中；《蜀书》共15卷，每卷都提到汉中，共50次；《吴书》中出现相对次数较少，20卷中有5卷提到汉中，共计9次。总体来看，《三国志》共65卷，其中有41卷提到汉中共计120次。出现的频次仅少于荆州的179次，远高于洛阳的93次，长安的90次，徐州的78次，成都的72次。另外，汉中的其他地名也多次出现在《三国志》中，如阳平（关）37次，南郑19次。如此高频率地被提及，说明陈寿认识到汉中在三国时期的重要性，才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汉中所发生的一切。陈寿把汉中永载史册，介绍给了世人，使汉中千百年来成为三国文化的重要区域。

通过《三国志》，我们会发现众多三国历史人物在汉中留下足迹。三国时期的汉中，各路豪杰在此汇聚，《三国志》中共录入人物四百多位，其中明确记载到过汉中的就有一百多位。

在陈寿的笔下，汉末三大割据势力张鲁、曹操、刘备逐鹿汉中，曹操两度前来汉中，留有“衮雪”“鸡肋”等典故；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胜利，在沔阳设坛进位汉中王。《三国志》记录了马超驻守阳平关与张鲁之女情缘和英年早逝的凄美故事。通过《三国志》，我们知道：汉中是司马懿献策被谓之“得陇望蜀”的地方，姜维在这里为蜀汉做最后一搏的地方。陈寿用他的笔和纸，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宏的三国英雄汉中汇聚图。

当然，对于今天的多数人来说，了解三国文化大多是通过明代罗贯中所写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但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就没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加工而创作的，在《三国演义》中，汉中更是大放异彩。

《三国演义》共一百二十回，共有四十六回提到汉中，出现134次。出现频次仅少于荆州的187次，远高于成都的104次，洛阳的96次，长安的74次，徐州的66次。另外汉中的其他地名如阳平（关）出现31次，南郑出现22次。

汉中在《三国演义》章回标题中直接出现了4次，分别是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第一百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作为《三国志》的作者，三国文化的鼻祖，陈寿是汉中三国文化的超级传播者，正是因为陈寿对三国时期汉中大事的详细记载，才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汉中波澜壮阔的三国画卷，才奠定了汉中在三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 □黄利民

民 俗

泥土味的信天游

我喜欢乡村人们自娱自乐时唱的信天游，喜欢他们甚至胜过那些在中央电视台、在各种大赛中获奖的明星的演唱。

在我看来，信天游是从土地中冒出的歌，整天在舞台上红着，离土地远，势必与信天游自身的泥土性、草根性、民间性、地域性、原初性疏离。越是声光电先进的舞台，越容易稀释信天游的本源性和原初性，越容易被包装成“四不像”。从真正负责任的民俗艺术传承角度看，是害怕过度包装和对舞台的过度迎合的。

我喜欢那些地地道道，纯粹用陕北方言演唱的信天游。陕北方言的表现力是独特的，用普通话演唱的信天游，其实已经不叫信天游了。比如，我们说女子受人喜欢，普通话多用美女一词，而陕北方言就用毛眼眼。美女更多偏重外观的表达，毛眼眼内外兼有，更有一种情致的韵味和有着内心喜欢的意味在其中，用普通话难以恰如其分准确表达其意思。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明星，甚至演唱信天游的歌手们为了得到更多人认可，一味走通俗化的路子，自己是红起来了，信天游的原初性、纯正性、独特性、地域性却被破坏，自己还浑然不觉。

信天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歌唱。一旦带上了功利性，那就离自己的初心、离自己的真情太远。表演之唱和性灵之唱天差地别——表演之唱，是未必过心、走心的歌唱，性灵之唱，则是从自己心底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歌声，是用泪水甚至血水唱出来的。这样的歌唱首先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泪流满面。而只有把自己感动了的歌，才有可能感动别人。

用方言歌唱、即兴地自娱自乐歌唱，这是信天游歌唱的两个前置条件，失去了这两个条件，其实就是失去了信天游最宝贵的原生态特质，就失去了信天游的个性。信天游之所以是世界级的瑰宝艺术，就在于它的民族性、特定的地域性。越是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世界性。

我爱泥土味的信天游，就是因为我爱其民族性。民族性的重要特质就是地域性。信天游是离人性最近的歌唱，歌者把自己的心门完全打开，把自己的情门完全打开，内心的隐秘完全打开。歌者的所有情的隐秘都让您看到，这种一览无余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感动人性的壮举，本身就具有打动人的魅力。

我有意识地和众多乡下人为友，他们的歌唱一旦响起，我听得如痴如醉——他们的原初性保存得那样完好，没有一点儿破坏。在我的熟人圈子里，这样的歌唱者太多，类似这样的歌唱者在陕北大地上太多。我经常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在陕北大地上，具有明星一样歌唱信天游水准的何止一千人，何止一万人？他们哪一个不能唱几首？即使是放羊人、洗衣女，高手在民间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软绵绵没有内涵的客套话。

我不敢说自己是欣赏、研究信天游的行家里手，但从真正传承、保护信天游的角度和层面说，我庆幸离这样的歌唱最近。至少让我身上保持很浓的泥土味、烟火味。有了这种味，我才不会分不清好坏美丑。应该感谢乡间的歌唱者，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真正传承保护信天游的主力军。信天游因为这种没有穷尽的泥土气而魅力无穷，而永远葱茏。 □王祖文

鉴 藏

为何唐三彩胡人角杯上会现身希腊『小海神』？

近日，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上，汇聚了十年来新发现的珍贵文物，不少文物都是首次展出。

展陈的文物中，陕西的出土文物“唐三彩胡人角杯”，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人物形象，吸引着参观者细细打量。作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唐三彩珍品，其人物原型是谁？又身携哪些秘密呢？

唐三彩胡人角杯上的希腊“小海神”

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件角杯中的人物不仅是胡人形象那么简单。为了与同类型的其他胡人角杯区分开来，人们习惯称这件文物为“小海神角杯”。

2021年2月4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东郊月登阁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唐三彩角杯。这件角杯长11.6厘米，造型灵动、色彩华美、图案鲜明。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酒杯形制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估计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交流激烈碰撞后传播到了亚洲。考古工作者因其外形状似兽角，命名其为“唐三彩胡人角杯”。唐三彩角杯出土于陕西、河南等地，部分散见于海内外博物馆。

作为融合中西方不同地区文化的典型，唐三彩造型多表现写实与浪漫，生动再现大唐盛世长安城生活现状、丝绸之路上商旅、骆马及货物等，极具装饰性与艺术性。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其“驼背上的微型乐团”，就是典型的不同文化交融的成果，表现了西域胡人小型乐队演奏的生动画面。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葛承雍研究发现，月登阁唐墓出土的这件唐三彩角杯，在人物形象上罕见地采用了单独的西方人的造型。初时，葛承雍推测这很可能是胡人饮酒喝醉的形象。可经过反复探寻、求教学者、考证比对后，他发现这件角杯中的人物形象竟是古希腊神话中“小海神”特里同的艺术造型。“该角杯整体呈海螺造型，其上的人物形象与古希腊小海神特里同有相似的基本元素，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葛承雍认为，海神特里同“向海而生”正是以海螺为标志，所以这不是普通的“胡人”形象，而是带有“神人”的具体寓意。

角杯作为舶来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证据。来通起源于古希腊地区，后经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唐代时，来通已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出现了方口、六边口、圆口等不同器形，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龙首式、象首式、犀角式、卧鸭式、立禽式、鹦鹉式等角杯，反映出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碰撞。

唐三彩角杯的艺术造型是一种外来文化的符号，在人际往来交流过程中，足以代替言语以物显意。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唐三彩龙首角杯，其造型奇特，制作精细，从造型和装饰手法看，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饮酒器角杯的特点和龙的装饰风格，又与外来的来通相似。

希腊“小海神”：在中国的演变发展

据此，葛承雍首次提出“希腊海神在中国”这一国际具象化课题。不同文明有不同神话体系，古希腊文明起源于爱琴海，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它的体系中对海洋的重视远超其他地区。

在古希腊人看来，大海是神圣的生命之源，拥有强大力量的海神波塞冬，一直是令人敬畏的存在。唐三彩胡人角杯上的“小海神”特里同，正是海神波塞冬和海后安菲特里忒的儿子，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海的信使。相传爱琴海附近的海员、渔民都对他们极为崇拜。

特里同的形象通常为人鱼，上半身为人形，下半身则是鱼尾，他与父亲波塞冬一样以三叉戟为武器，但其最重要的象征物则是海螺壳。当他用力吹响海螺时，就能扬起或平息海浪川流，因此特里同常被当作镇海之神。

确定了人物原型，葛承雍从多方面剖析了这件文物。在他看来，希腊文明是丝绸之路建构欧亚文明交流关键的内容，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的角杯不仅在客观上证明了中古雕塑艺术的创新实践，而且有益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多维价值。

这件唐三彩角杯上的人物形象明显不同以往，其身体微微后仰，双目直视前方，年轻的脸部细节正符合小海神特里同的容貌特征；同时，人物双手举着海螺壳放置于嘴边，做吹奏状，也与古希腊神话中所描绘的特里同吻合；角杯的整体造型神似一只海螺。

葛承雍特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角杯上的人物头戴多层折边圆高帽，这很可能是地中海东部流行的弗里吉亚软帽，而并不是传说中拥有长卷发的特里同原貌，说明该角杯造型已渐渐褪去人物原型的本来外表，转变成了中土熟悉的胡人面貌。此外，角杯背面还装饰有古希腊神话常见的鸢尾花、日冠花、神翠鸟等纹饰，成为葛承雍作出判断的又一有力佐证。 □段杨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